

碑帖鉴赏

读先贤手迹 重识南社风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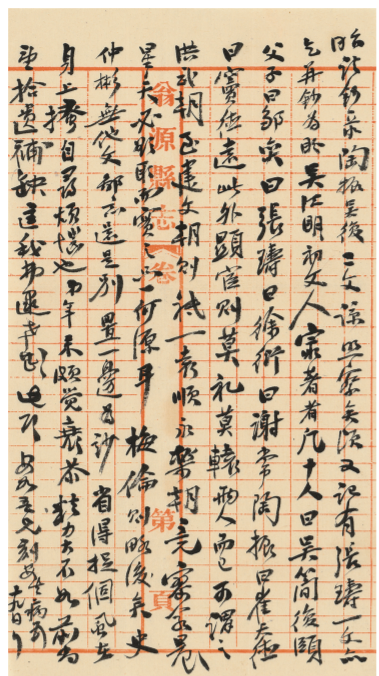
■ 贞堂

2月21日,由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民革苏州市委、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的“南社社友墨迹珍藏展”在苏州中国南社文史馆开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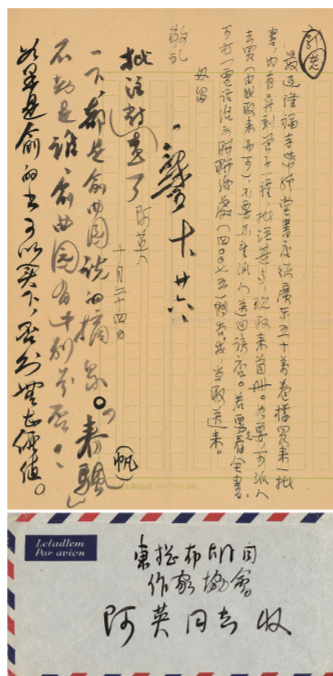
2019年恰逢南社成立110周年,该展是系列纪念活动的首场,汇集了海内外珍贵南社先贤手迹,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元培、陈独秀、陈去病、高旭、柳亚子、黄炎培、李叔同、苏曼殊、于右任、刘半农、沈钧儒、沈尹默等近百位南社、辛亥革命先贤的手迹墨宝。据了解,展览展品很多都是首次公开面对公众,展示了南社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深远的意义。

南社是中国近代最大规模的文人社团,成立于1909年,解体于1923年,参社社友最多时达1100多人,遍布国内13个省份,39个城市,大多为戊戌变法之后出现的新型知识分子,是近代中国文学、艺术、教育、新闻、出版、翻译等多方面精英的集合。政治家黄兴、宋教仁、于右任,文学家苏曼殊、包天笑、周瘦鹃,书画家黄宾虹、白蕉、沈尹默,报人戴季陶、邵飘萍、林白水,戏剧家吴梅、李叔同、欧阳予倩,翻译家马君武,教育家经亨颐,国学家邓实、黄侃、马叙伦,创办《科学》杂志的杨杏佛,任鸿隽,女词人吕碧城、张默君,都曾列名社籍,在不同时期参加过南社的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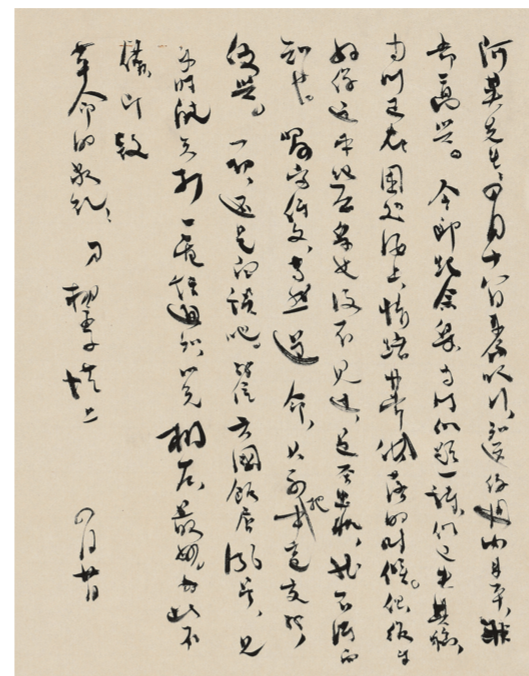
南社上承封建王朝,下接新文化运动,其成员既是中国最后一批系统接受传统国学教育的文人,又是较早开眼看世界的文化先驱。新文化运动之前,改造社会、唤醒民众的思想启蒙、思想解放工作,基本都是由南社这一代新兴知识分子在推动着。上海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陈颖介绍:南社人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可分两方面,一是引进西学,二是保存国学。不同于人们通常对南社的认识,事实上许多西方先进文化都是由南社人率先介绍到国内的。如:李叔同(1880—1942,南社人社号为211),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他曾于1905年东渡日本留学,他与留日同学曾孝谷等创办的“春柳剧社”是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曾在日本演出话剧《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苏曼殊(1884—1918,南社人社号为243),早在1903年翻译的《惨社会》,成为硕果《悲惨世界》的中文首译本。他还是第一位系统翻译拜伦诗歌的诗人,他的翻译诗集《拜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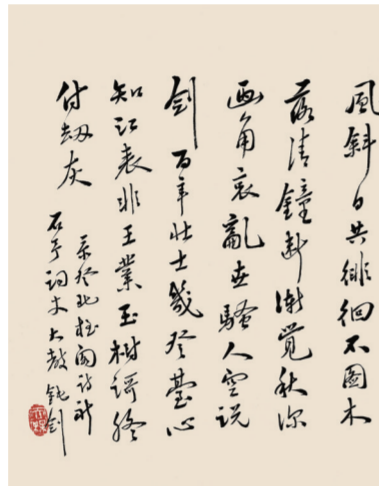
陈去病致柳亚子信札



郭沫若与阿英往来信札



柳亚子致阿英信札



高旭致胡石于诗稿



黄侃致江瀚信札

诗集》则是中国翻译史上第一部外国诗歌专集。夏丏尊(1886—1946,南社人社号454),所译《爱的教育》对中国教育之影响巨大。

另一方面,近代对于国学的研究保存,南社人也一直起着主导作用,他们致力于对传统文化的梳理整合,使之重新焕发出生命活力。早在1905年南社成立之前,南社社友就曾成立国学研究组织——国学保存会,这也是当时提倡保存国学的最重要的民间学术组织,其主要干将如章太炎、邓实、诸宗元、黄

节、刘师培、陈去病、马叙伦等,都是当时一流的国学家。南社社友在中华民族于西方文明的入侵下开始现代化的历程中,实现了对中华文化主体的坚持,承担起了中华文化的薪火相传重任。事实上,南社社友不少人本身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如众所周知的新文化干将沈尹默等。而到1923年,柳亚子、叶楚傖、胡朴安、余十眉、邵力子五个南社旧人,加上陈望道、曹聚仁、陈德徽三个新文化的新人,于该年发起成立新南社,立场

鲜明地站在新文化一边。其他南社社友在这期间也办新刊物、写新诗,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可以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南社与新文化运动都是推动社会变革与文化革新的重要力量。在南社活跃的十几年间,以南社社友为代表的新型知识分子,怀着国魂丧失的隐忧,致力于保存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民族文脉,为新文化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保存中华传统文化付出了一代人的努力。

陈国华:笔书家国情怀

■ 本报记者 梁腾

《两岸一家亲共圆中国梦》《艺海飘香传两岸》《文化同根书画同源》《情系宝岛》……这些书法作品,是北京书法家协会理事陈国华在“第八届北京特色周暨2018年地坛文化庙会·高雄之旅”活动中书写下的。他感叹:“通过在现场挥毫泼墨,交流切磋,用传统艺术的形式大大地增进了两岸艺术工作者的

友谊,用艺术作品最大限度地凝聚起了我们的文化认知。”

年逾花甲的陈国华籍贯江苏南通,自幼得到艺术熏陶,在音乐、表演等多个艺术领域勤耕,而这也成为他书法创作的丰富营养。他曾在多种岗位工作,并多年担任江苏南通驻京办主任,热心为家乡经济建设发展服务。

在京工作期间,他的书法艺术为家乡的招商引资工作带来极大的帮助,他说:“我愿意用自己的书法作品与人交流,自己的书法遇到了知音,我就相赠。”想必也正是因为他诚恳,陈国华结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好友,而贯穿其中的轴线正是书法。无论从事何种工作,都没有阻断他对书法艺术的热爱和追求。

当年,陈国华因家乡文工团等单位工作需要,常笔飞墨舞,后来参加中国书协高级研修班深造,得到中国书协刘艺、张德育、沈鹏、吴传麟等先生的传授。这一路走来,他以勤奋刻苦,坚强的毅力,埋头钻研书法艺术,经常与书画大家交流,即使躺在床上,陈国华脑子里也在思索着书法作品的内容。冬去春来,也让他在国家级书法大赛中屡获殊荣。

中国国家画院院委、北京书法家协会主席林岫曾指点他:“习书先取厚重朴实,易得自然佳妙,反之易失。”这也成为陈国华在书法上的追求。

陈国华的书学之路建立在长期坚持临摹古人碑帖之上,几十年如一日。其书法以行书为主,他认为,书法能在简练的线条造型中表达人类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在欣赏时如同观看优秀的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作品,使人联想起美好的生活,而行书的流动性能让他更好地表达这些感受。

他对行书有自己的见解:但凡行书创作者必须有很好的功底,如人的成长,不经历“三翻六坐七滚八爬”便难以站立和行走,因此坚实的基础是必要条件。再则要强调理法通达、笔力遒劲、姿态优美。更为重要的是创作前的酝酿、对题材、体裁和表现方法等做到心中有数。而“险中求平”“力求和谐”成

为了他行书布局谋篇的重要技巧和追求方向。

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原书记顾勇华看来,陈国华对书法有着执着的追求,静心研习书法理论和书法艺术的同时,不断提升书法艺术素养。他说:“书法的创作并不易,陈国华的起步从正楷开始,无论是偏旁结构还是笔法技巧都有自身的规矩和范式。如果以十年为一个阶段,十年前其作品就已有自己的特色,那么十年后的今天再看,他依旧没有停止探索,依旧还在想着突破。”

陈国华从楷书、隶书、篆书到行书、草书的学习,让他感受到,书法作品不仅蕴含着书者的技艺,更让他找到了一个表达途径。所以多年来,作为一名书法工作者,陈国华还致力中国书法在国内外传播。他曾三赴西藏拉萨,为边陲地区的藏民、师生及驻藏官兵书写作品;又至云南西双版纳创作了反映少数民族改革开放以来精神风貌的楹联;还曾将自己的学书所得、所感传播至俄罗斯莫斯科。他坦言:“我最看重‘书法工作者’和‘首都艺术家志愿者’这两个称号。”

此次“高雄之旅”活动中,为了做好与当地书法爱好者的互动环节,讲好“中国书法”这一课,他对中国书法概论进行了新的梳理,同时写下《我们都是中国人》《我的家乡我的根》等内容,并向高雄市赠送了《让春天从高雄出发》《惠风畅爱河》等书法作品。“因为‘爱河’是高雄的母亲河,同样的语言、同样的文字,我想用《惠风畅爱河》表达两岸人民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深深的热爱。”陈国华说,“我愿意用手中的这支笔为祖国的大好河山立传,书写时代的滚滚浪潮。”



唐诗一首 陈国华

《姚伯多造像记》的“不理性”

■ 徐建敏

“像”主要指基于宗教信仰而制作的崇拜对象。因此所谓的“造像记”,就是指制造这些像的题记,即各种宗教石窟、神龛等像的制作留下记录的文字。

姚伯多(生卒年不详),北魏书法家。姚伯多于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年)九月与梁冬姪等人书写并雕刻了《姚伯多造像记》石刻。正面现存624字。《姚伯多造像记》亦称《姚文迁造像碑》《姚伯多兄弟造像石文像》。1936年迁置陕西耀县碑林,现藏陕西耀县博物馆,和药王山其他石刻一起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北魏太和年之前,陕西关中地区的造像题记并不多,能见到的仅有《魏文朗造像碑》(424年)和《皇兴造像记》(471年)。随着当时关中地区部族矛盾加剧,爆发了连年战争,造成社会动荡,老百姓流离失所,无法安定生活,只能寄希望于来世能躲避战乱,得到快乐,于是拜佛求道逐渐流行起来,造像题记之风渐盛,《姚伯多造像记》等一批造像题记便应运而生。

《晋书》《魏书》中有对于姚氏家族的记载,姚姓是关中地区西羌族中的大姓,曾建立过“后秦”王朝。《姚伯多造像记》的碑文记载:“太和二十年,岁在丙子,姚伯多、伯龙、定龙……上为口主,下为七祖眷属敬造皇先君文石像一躯。”可以看出姚伯多家族庞大,族谱完整,非普通部族也。该碑文辞流畅、刊刻精美,有1200多字,是现存造像中文字最多的,这样的精美之作不是一般的百姓所能完成的。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姚伯多家族应该就是后秦西羌族姚氏的后裔。

在我看来,既然《姚伯多造像记》是记录制造宗教佛像的题记文字,就应该是神圣庄严、讲究规则和秩序的。但打开拓本,一股江湖人的浮夸敦厚之气便扑面而来。细看这些文字,只见它们脱胎于魏晋,笔法有汉隶痕迹,用笔或方或圆,线条质朴古厚,感觉并不那么“理性”。如“合”字的撇起笔是圆的,收笔是方的,“生”字的三个横画起笔和收笔或圆或方,方圆随意互用,无规律可循;“之”“陵”的捺笔取法汉隶,收笔略微按,拙朴自然。可以说,碑文中这样的用笔和线条比比皆是,它们并没有我想像中的那么中规中矩,反倒有一种叛逆不羁、恣意自由的个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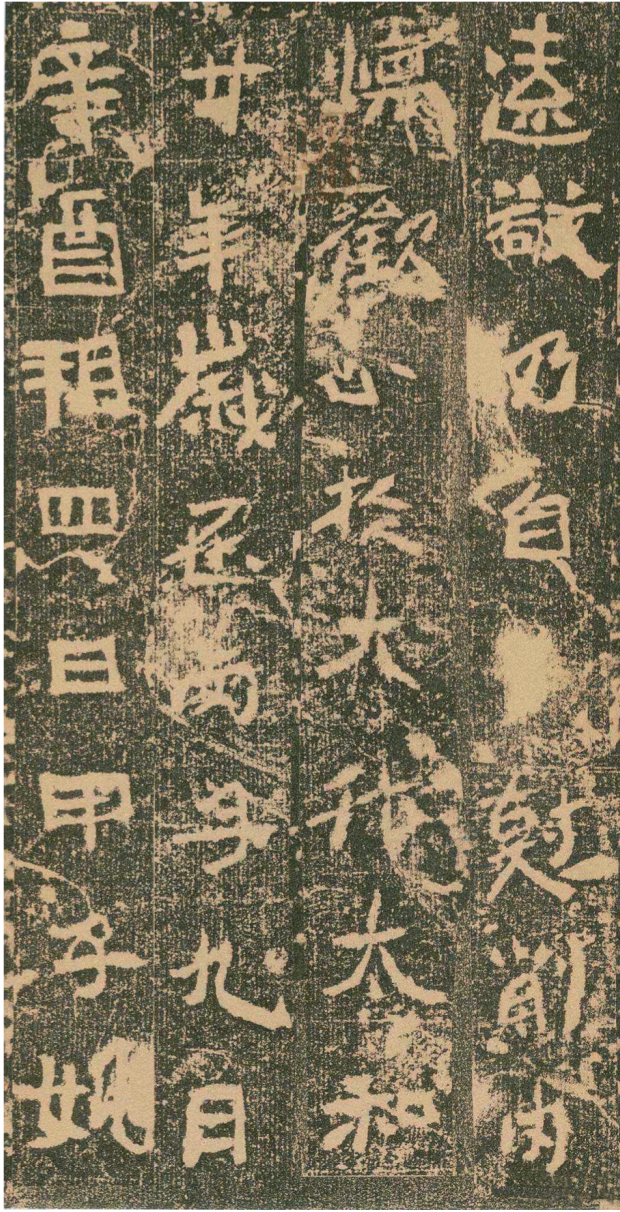
《姚伯多造像记》的结构更是“不理性”。首先表现在字的外部轮廓比较方正,但字内空间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斜正、大小、动静变化十分自由,庄重之中蕴藏着调皮可爱。如“照”

“安”的上半部分写得比较平正,下半部分就有意地取斜势,显得不那么“安分守己”,如同在平静的外表下藏着一颗骚动不安的心;“远”字的右上部分和“群”字的左边部分撑开,姿态非常大,相应地,走之底和“羊”就小得多,仿佛是一位妈妈牵着孩子的手在公园闲逛;“清”字的三点水和右上部分写得比较平正,“月”字就好像一块石子投入小河,打破了河面的平静,漾起阵阵涟漪。以上这些字内空间的安排看似信手拈来,但在我看来则是书者的有意安排,好像看到了一个武功高强的侠客在挥舞着醉拳,看似身体东倒西歪,摇摇欲坠,实则重心平稳,招招凶狠。

其次,《姚伯多造像记》结体的“不理性”,表现在和一般楷书、隶书很不一样,打破了我们日常书写的习惯。如“唯”的口子旁居然布局在整个字的左上方,又用撇画托住它,真是脑洞大开;“其”字横画大开大合,犹如一个原本肃立不动的佛像正张开双臂欢迎你;“像”字的右下部分更是不守规矩,原本纵向排列的三个撇画却让它们横向排列;“明”“众”二字打破常规,“明”字把日写大,“众”字打上半部分写大写松,与我们习惯的上紧下松的结体规则大相径庭。这一个一个鲜活的字给我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就如同我吃惯了家乡的杭帮菜,某一天突然和朋友去吃了一顿陕西羊肉泡馍,肥而不腻,香气四溢,诱人食欲,吃后回味无穷!

再看看《姚伯多造像记》的章法布局,也是那么“不理性”。如字的大小、疏密、歇脚看上去秩序凌乱,却又安排得错落有致,犹如书者穿了一个个姿态各异、形状不同的贝壳穿成了一串美丽的项链,那么自然和谐。

民国名家于右任将《姚伯多造像记》与《广武将军碑》《慕容墓碑》称作三绝。赞评它“刻石中许多行款不齐,字体大小参差,似未曾画丹而直接书之,自然谐调而天趣盎然。此碑堪称北朝书法之异品”。日本友人关野雄称它是“一种罕见的楷书”,造像“粗犷”,且“具备了龙争虎跃的真实感”。在我看来,《姚伯多造像记》无论是笔法线条、结构布局都是“不理性”的,但却让我看到了一种美,就好像看到一个浪荡不羁的游子街头边弹着吉他边扯着沙哑的嗓子唱属于他自己的摇滚乐,是如此震撼人的心灵。想想在那个讲究等级和秩序的社会,处在战乱漩涡中的人们是多么希望能过上和平、自由、快乐的生活。可是现实是残酷的,所以“姚伯多们”彷徨、祈求、叛逆、怒吼,用笔、用刻刀宣泄着他们心中的情绪。想到这,我顿然领悟:哦,原来《姚伯多造像记》的“不理性”是如此之美!



北魏姚伯多造像记局部